

中将王尚荣与 夫人黄克的 风雨爱情

□ 罗元生



王尚荣与妻子黄克在一起(1988年摄)

“难道我还不相信你？”肃反风波，黄克想到了自杀

1943年初春，寒气逼人。

一股肃反扩大化的寒风从西北高原吹到了绥德警备区，当时的中央社会部长康生作了《抢救失足者》的报告，掀起了所谓“抢救运动”，大搞“逼、供、信”，革命队伍中顿时人心危危、乌烟瘴气。

王尚荣去西北局开会的第二天，司令部的一位同志找到黄克：“从明天开始，你到政治部党支部参加整风。”

黄克心里一惊，到政治部作什么？是把自己列为整风对象吗？这不大可能呀！不可能的事还是发生了。

一位和黄克相识的人“勇敢”地揭发了她：有人找过黄克，让她给首长下毒！

“你是怎样参加革命队伍的？你的身份很清楚吗？”

“你嫁给王尚荣的目的是什么？做了个‘官太太’，你了解些什么？”

“你的一举一动，你想过后果吗？”……

一连几天几夜，车轮式的谈话，严厉的言辞，反复地诱劝，不外乎想审出一点“有分量”的东西，

让这个“失足者”及早承认自己的问题。

这天夜晚，黄克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，心中像压了块大石头，欲哭无泪，欲怒无言，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如同将她陷进了一潭污泥之中。

刚出生的女儿甜甜地睡着了，黄克心里起伏难平，“我参加了革命工作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为了抗日，从东北到北平到延安，心中始终坚持着中国共产党能救国救民，这哪里有错？我与王尚荣经罗校长、贺师长介绍确立夫妻关系，在同一战壕里出生入死，又是哪里不对？”黄克甚至还想到，当时要不是罗校长亲自撮合，说不定自己还不嫁给王尚荣这个“大官”呢，怎么嫁给“首长”就是有野心，就是动机不纯，就是失足者呢？黄克怎么也想不通。刚烈的她在脑中忽然冒出个念头：与其这样被人无辜地威逼审讯，到不如一死了之，清清白白地不让尚荣受牵连。她匆匆抱起可爱的女儿，来到村中的那口井边，就在她想纵身一跳的时候，女儿的哭声揪住了她的心。她不由一怔：不能这样，不明不白地去死，假的也成了真的了吗？尚荣将怎么想？她改变了主意，抱着女儿匆匆回到家，在油灯下写了一纸情况汇报。

第二天一早，黄克就把这张报告连同女儿一

起放到了政治部主任的桌子上。

就在黄克焦虑地等待消息的时候，王尚荣带着警卫员过来领人了。

黄克一见到王尚荣，心里难过至极。她觉得，都是因为这场婚姻才给彼此带来如此大的磨难，便没好气地说：“我是要毒死你的特务，还来接我干什么？”接着，便呜呜地痛哭起来。

王尚荣却宽慰地笑了：“组织上这样做，是对革命事业负责的态度，唉呀，这样一查，不证明你是好同志了吗？”

黄克余怒不消：“那不是还没审完吗？干嘛他们现在让你接我回去，我已作好了准备，女儿都带过来了，他们不审查清楚，我决不会回去！”

“哎，算了算了。我不是相信和了解你吗？组织上怀疑是组织上的事，别人审讯逼供是别人的事，难道我还不相信自己的老婆，不管人家怎么说，只要我心中清楚就行。对于这样的事，你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对就接受，没有就别想其他的，不能愠气；再说，原来反映这个事的人现在也改口了，说是被逼得无奈瞎编的……”

王尚荣接着又说：“一个人受点冤枉是正常的，我在1933年的时候，也被打成‘改组派’，当时，我正跟着红军队伍在湘西搞游击战争，突然上边来人，不由分说就把我捆走了。不少同志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倒在自己的枪口下，大概是当时阎王看我太小，不愿意收这么年轻的徒弟，我才从死神那边走了回来；后来发了我五块大洋让回家，我却死活不走，我生是革命队伍的人，死是革命队伍的鬼，干革命就没打算过活命，管他怎么死呢？这不，我现在不是活得挺好的吗？看来，这你得向我学习学习，不就刚刚逼审你，就啥也不顾了呢……”

一番话，终将黄克说得破涕为笑。她更了解了尚荣，更感到这是一个宽大的胸怀，一个可以终生倚靠的温暖身躯！

七八月间，独一旅的审干“坦白运动”热火朝天地闹了起来，一下子有问题或可疑的干部达240多名。有些人“坦白”了又“翻案”，今天“翻案”，第二天又“坦白”。领导上则大搞“逼、供、信”，“坦白”受到“优待”，坚持真理者则受到打击报复。“难道这都是真的吗？”王尚荣彻夜难眠痛苦地思索着，“抢救失足者”开展得如此如火如荼，对抗日战争渡过难关到底有多大好处？作为独一旅副旅长，他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。这么多党员、干部

如果都是假的，不忠于革命事业，怎么能带兵打了这么多胜仗？王尚荣想了许多，一时怎么也找不到答案，他反复在心中对自己说，莫非“运动搞错了？”他与朱辉照政委反复交换意见，在当时那种形势下，王尚荣还是大胆表露自己的心迹说：“肃反运动在党内以前也有过，我们是吃过大亏的，现在不能再这样葬送革命的成果了！”他命令自己的警卫员悄悄地给联防司令员贺龙、政治委员李井泉送去了报告，提出对此问题的看法。党中央也了解到独一旅审干发生了一些错误，决定加强领导。“王尚荣这个报告情况很有分量，我看独一旅的审反运动该降温了！这么多表现好的同志党员都是‘特务’，我们打日本还打不打？！”贺龙激动地说。

“你到独一旅去，摸一摸情况，帮助他们进行平反！”贺老总对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说，“领导上已承认了错误，但受了冤屈的干部意见仍然很大，旅领导常受到干部们的包围质问，弄得很难工作。”于是，在贺老总的直接干预下，杨琪良和甘泗淇着手于平反工作。“这给我们上了一课，我们要的是和平统一安定的工作环境，人心危危怎能搞好工作打赢敌人？”甘泗淇感触颇深地说。

“这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。我们这样就更加明亮了！”王尚荣向黄克认真地说。

黄克的心暖融融的，她紧紧地盯着尚荣，不停地点头。

风云突变，王尚荣被押进了监狱。“黑干将”的妻子给周总理写信

就在王尚荣呕心沥血，不分昼夜地坐镇中枢，盯着祖国的东南海防的时候，他怎么也没料到，一场意想不到的“战争”会突然铺天盖地袭来，把他卷入旋涡并淹没多年。

1965年12月初，作为总参作战部长的王尚荣突然被召去上海，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。一到上海后，他发现这个会议的主题是批判罗瑞卿总长，并将其定性为反党、反社会主义、反毛泽东思想的“三反分子”……

前些天的报纸上不是还称罗总长为“毛泽东的亲密战友”、“好学生”吗？王尚荣感到愕然！

会后，他私下对秦基伟等老战友交谈时说：“定罗瑞卿总长为反党分子，我实在想不通，罗瑞卿会有什么问题？”

接着，他理直气壮地说：“还不是林彪向毛主

席告状,诬告罗总长有意夺他的权!”

然而,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,半年多之后,他自己竟也成为“阴谋夺权者”,被揪了出来。

9月1日,以中央军委名义宣布了“王尚荣、雷英夫停职反省”的决定。9月3日,又派两位副总长到作战部召开干部会,动员干部对王尚荣等开展揭发、批判,并给王尚荣先入为主地定下了“反党夺权”和“企图颠覆总参党委”的罪名。

从9月22日开始,在林彪等人的指使下,作战部召开党委扩大会,对王尚荣进行揭、批、斗。开会期间,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作了要王尚荣“隔离反省”的决定。

首先是用“毛家湾党支部”(林彪驻地)名义贴出了攻击贺龙驻地的16名群众写的“炮轰办公厅党委”的大字报,林彪、叶群竟然要利用这张大字报来诬陷贺龙与王尚荣是“早有预谋的”,“反党活动密切配合”。然后又以总参文革小组和军委名义三次发电报,要求全军都来揭发王尚荣的“问题”。

王尚荣并不害怕,他说:心正不怕邪。自己与贺龙元帅是战友加同志的关系,红军时期,八年抗战,他都在贺老总的领导下,打了许多胜仗,学到了许多带兵打仗和如何做人的经验。1953年秋至1954年冬的不到两年时间里,贺龙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时,工作上又有过来往。他敬重元帅的功勋、人格。他相信贺龙不会搞“兵变”,把自己列为“兵变”的“黑干将”。

在这场腥风血雨铺天盖地到来之际,黄克时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尽管王尚荣坚信自己不是什么“三反分子”,但黄克还是劝他要作好足够的思想准备。

一天傍晚,王尚荣低着头,沉思良久,他对黄克说:“如果真有那天,你要做到三条:一是相信我们自己没问题;二是要照顾好这个家,带好孩子;三是相信总会有团聚的一天……”

这一天,很快就来了。9月24日,从一辆吉普车上跳下几名军人,他们把王尚荣押进了囚车。从

此,王尚荣被“隔离”在大院胡同12号的一间小屋里。

26日,总参文革小组的领导成员给总参党委写了建议组成专案小组的报告。10月4日,总参党委批复作战部党委:同意关于成立王尚荣等专案小组的报告,主要任务是搜集、整理、调查、核实王尚荣的所谓“反党罪行的材料”和起草、编写所谓“定案材料的报告”。

江青对专案小组的人员说,“总参有鬼,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抓出来,就是多抓了也没问题!”1966年12月30日,江青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煽动说:“贺龙有问题,你们要造他的反!”

1967年2月初的一个夜晚,林彪把江青等一帮亲信召集过来。江青首先面授机援,说:“要搞倒总参,必须先从作战部动手!要放火烧山,越乱越好!”

林彪发话了,“王尚荣与贺龙是一个鼻孔出气的,对王尚荣要斗倒斗臭,要罢官。宁愿提个连长当作战部长,也不要这个人!”作战部党委于6月17日再次派人找王尚荣,极为严肃地说:“你要交代同贺龙、廖汉生的关系,这样对你有利。”王尚荣作为一个党员、作为一名正直的军人,良心和责任告诉他,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

见风使舵。王尚荣理直气壮地明确表示,“如果你们尊重事实,我王尚荣与贺龙、廖汉生没有任何不正常的关系!”

2月22日,王尚荣被押送到北京西邻卫戍区的一处营房里。

这里曾经是清朝末年一个落魄王公的小行宫,解放后,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曾住在此地。可是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关押被“打倒”了的共产党要员的绝密监狱!

王尚荣被安置在一间简易平房里,除了一张小床外,别无他物,有一扇小窗,也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的,小窗的下端开了一个巴掌大的正方形



王尚荣于1955年授于中将军衔时

小洞孔，洞孔上挂着一小块白粗布帘子，这是哨兵观察情况的专用“观察口”，洞口虽小，但能看清囚室每个角落的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。按照上级要求，哨兵还要通过这个小小的洞口，每隔一分钟观察一次，认真做好记录，看看“特犯”是规规矩矩，还是乱说乱动，或者是妄想逃避惩罚而图谋自杀等。

王尚荣在这个“监护点”里被统一编为“第八号监护对象”（以后哨兵们都喊他“八号”），在这里同王尚荣一起被“监护”的还有彭德怀、黄克诚、罗瑞卿、谭政、陈再道、彭真、陆定一、林枫、李井泉等。

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后，在囚室里的王尚荣开始看到一线春天的曙光。

在囚室里渡过五个春秋的王尚荣，感到有平反和恢复自由的希望了。“九一三”事件后，中央二办和总参谋部的领导班子，经过批准进行了调整，对王尚荣的“专案审查”，也随之出现了明显的变化。先前那种扩大化、妄加罪名的逼供式的“突击审讯”和“围攻”，终于有所收敛。

1972年4月，王尚荣的三儿子王柏德由山西浑源县各坨大队，去河南明港看望病中的妈妈，返回时路过北京，听说有的老干部已经解除监护了，他便壮着胆子向专案组请示，要求去探望多年未见过面的爸爸，出乎意料要求被批准了！

专案人员把王柏德带到了八里庄附近的一个院落，让他在这里等着。

妈妈在来信中早已叮嘱过他，只要一见到爸爸，一定要想办法给他照几张相带到河南来，让妈妈和弟弟、妹妹看看爸爸这几年在监狱里的真正样子。柏德好不容易从山西借了个照相机，把它藏在随身挎的军用小黄包里。他想，今天见到爸爸，不管他是什么样子，我一定要给他拍几张最好最清晰的全身照，让妈妈和弟弟妹妹高兴高兴！

等了一个多小时，柏德终于看到爸爸慢慢地向他走来。他的背驼了许多，胡子拉叉乱作一团，衣服又脏又破，这哪像印象中的父亲！

柏德迫不急待地扑上前去，连连叫道：“爸爸，爸爸！我是柏德呀！……”柏德强忍悲愤，抑制住自己的感情。他怕爸爸伤心，妈妈曾经多次严肃地向他们兄弟姐妹交代过，不管在什么时候或是什么地方，见到爸爸不准掉眼泪，不准哭，不能给爸爸再增加心理上的伤痛。专案人员和哨兵一转身，柏

德马上就偷偷掏出照相机，不停地给爸爸拍照，一张又一张，可是，不到两分钟时间，就被专案人员发现了。他们慌忙跑过来，恶狠狠地质问道：

“谁让你在这里拍照？这早有规定，难道你没长眼睛？”

于是，不由分说，随手把柏德的胶卷全部没收了！

柏德心中顿时燃烧着一团愤怒和仇恨的火焰。他拼命地咬着牙，紧紧地攥着拳头，把眼泪吞进肚里……

王尚荣抚摸着儿子的头，端详着他的脸，声音沙哑地询问起这几年来家里的情况，询问着黄克的处境。柏德按照妈妈的规定，只讲好听话。他告诉爸爸，妈妈和弟弟允泉、妹妹和平在河南“五·七”干校劳动，大哥二哥、大姐二姐他们在陕西、山西插队劳动，柏德告诉他大家身体都很好，只是非常思念爸爸。注视着久别重逢的亲骨肉，倾听着他讲述的新情况，王尚荣胸怀稍得舒展。

黄克带着小女和平和有病的幼子允泉在河南信阳县明港镇“五·七”干校劳动改造。一开始母子三人在一起，虽然生活艰苦，但每天能团聚在一起，相依为命。可是，没过多久，干校领导接到“上级”首长的通知，要求对黄克要认真改造，严加看管，并定期汇报她的劳动学习情况。于是，和平被勒令到林场劳动，允泉被安排到农场养羊养马，黄克去菜园种菜。母子三人拆得东一个西一个。黄克的心在滴血，自己的骨肉近在眼前却如隔天涯，想见一面都困难重重。

长期的劳累、高度的精神压抑以及无休止的牵挂，黄克经常性的彻夜不眠，导致了眼底出血，疼痛难忍，视力一天比一天下降，快要变成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了。

干校不敢给她这个“黑干将”的妻子作任何医治，黄克只得写信向原单位求救。原单位也无能为力。后来，病情一天天地恶化，眼底连续黄斑出血，在万般无奈之际，黄克想起了周总理。

总理接到黄克的信后，心里不是滋味。他浓眉紧锁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王尚荣这个人我清楚，他是个老实人，对党对革命有功，他的老婆和孩子如今落到这个地步，这像什么话！……

1972年5月，在总理的批准和多方努力下，黄克带着两个孩子，由河南回到了北京，这才有了医治眼病的权利和看望丈夫的机会。

一踏上北京的土地,黄克就心潮起伏,她恨不得立即插上翅膀飞到王尚荣所囚禁的地方,去看个究竟。

然而,约定允许看望王尚荣的这天,专案组只准允刚、和平、允泉三兄妹去看爸爸,却不准黄克前往。

黄克愤怒至极,争辩道:“老婆子从几千里外来见一次老头子,有什么不对的!为什么不允许我去!……”

不管黄克怎么争辩,专案组就是不许。

专案组给三兄妹规定了“三不准”:见到你爸爸,一不准讲林彪事件;二不准问案件的性质;三不准问住在什么地方。

黄克把女儿和平叫到身边,低声向她说:“你去问问爸爸身体好不好,说我现在就在北京,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见到他。”并反复叮嘱孩子们,一定要忍住,千万不能在爸爸面前掉一滴眼泪。

和平和允泉在哥哥允刚的带领下,在规定的接待室里等候着爸爸的出现。王尚荣被看守哨兵带了出来。和平一下子飞跑过去,扑在爸爸的怀里,她搂住爸爸,拼命地摇晃着他的身体,和平在爸爸的耳边,不停地说:“爸爸,你的身体好不好,我妈就在北京,她会马上来看你!”

王尚荣神情呆板,只是不停地发出“啊!啊!”的喘息声。

和平极力忍住自己的泪水,继续用力摇晃着爸爸,趴在他的耳旁,说:“爸爸,林彪是个大坏蛋,他叛乱出国,已经摔死了!”王尚荣没有听懂女儿的话,可专案人员和看守人员却听懂了,他们马上走过来,把和平强行拉开,和平紧紧抱着父亲,险些被拉倒在地。这时,王尚荣才好不容易地清醒过来。

他猛力地摆摆手,略停了一下,轻轻地抚摸着幼子允泉的头,眼中慢慢溢出亲切温柔的光。

然后,他轻声地问允泉,“你妈妈身体好吗?”允泉点了点头。三兄妹也有自己的办法:他们把所知道的事都讲给爸爸听,对一些关键的话,害怕专案人员听到后进行干涉,就有意把桌子上的茶缸撞倒,用手指蘸水写字让爸爸看。就这样,王尚荣知道一些老首长、老战友已经“解放”了,尤其是周总理批复黄克的信,使家人能与他会面,他脸上流露出微笑,显出由衷的喜悦。

这是王尚荣多年来的第一次笑容,是望见晨

曦的欢欣。

黄克虽然从孩子们口里了解到王尚荣的一些情况,但无论如何没有见上面啊!眼见为实!她总不能辛辛苦苦来趟北京,连日夜挂念的丈夫也见不上一眼吧!

黄克怎么也死不了这条心,她反复地寻找机会,向专案组提出抗议。12月27日,专案组终于允许黄克去看望王尚荣。陪同她的有允刚、安青、和平、允泉这四个孩子。

专案人员对黄克说:“你身体不好,来个医生一起去,防止你犯病。”

“谢谢。”黄克接着说:“七年啦!老婆子第一次看望老头子,无非是激动些。我的病主要是思想问题。在政治路线斗争中,我知道应该站到哪一面。我对自己,对王尚荣最清楚,不需要医生去!”

仍是在八里庄附近的那个院内,在那一排平房里,黄克与王尚荣终于见面了!

“真够难为你了。你身体不好,又拖着这么多孩子。他们从出生到长大成人,我一概没管过。你又过早复员,没有工作,没有工资收入。我出去之后,就是拉三轮车,也要养活你和孩子们!”王尚荣动情地对黄克说。

“我听说你挨打、受罪,早就想来看你,但他们不准!”

黄克安慰着王尚荣,继续说:“你临走时嘱咐我的话,我都给孩子们讲了,他们都坚信爸爸没有问题,也都经受了锻炼,长大了,成熟了。但没想到你一走会这么多年。现在总算见面了,也有权利看你了!”

黄克一边说着,一边用手抚摸着丈夫,当她看到王尚荣两腿肿得厉害,她心如刀绞,泪盈欲滴,也顾不得有孩子们在场,让王尚荣解开衣扣,退下裤子,检查他全身被打伤的情况。

王尚荣身上有明显的伤痕,黄克这时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愤怒,声色俱厉,喊来了专案人员。

“这是你们打了他的心脏和下身要害部位所造成的,法西斯手段!我要向毛主席、周总理写报告,请示送他到医院治疗!”

四兄妹也围了上来,见此情景,无不惊讶。第一次来看爸爸的安青,强掩怒火,也开腔质问:“我爸爸究竟有什么问题,你们这样对待他?贺龙的问题都清楚了,我爸爸还有什么事?”

一名专案人员吱吱唔唔地说:“最初是按‘反

革命’对待，我们也得划清界限，不然也得关起来受迫害！”

“我早就讲过，我的问题很简单，一天一天地数，也能查清楚，根本不需要七八年的审查。耽误了我为党工作的好年华。即使不让我工作，我也还要革命，跟党走到底。”王尚荣急忙插话说。

就是在这种时候，他心里装的仍旧是党的事业！

自此之后，黄克带着孩子，把写给毛主席、周总理的报告，送到中南海西门接待站转报。

1972年1月10日，毛泽东亲自参加了为陈毅元帅举行的隆重追悼会，并接见了陈毅的夫人张茜，肯定了陈毅是个好人，是个好同志，是支持他的。毛泽东的这一席话，无疑是给受“二月逆流”而身陷冤狱的一些老干部，带来了希望的曙光。



王尚荣在实地考察中

1974年7月29日，毛主席亲自指示：王尚荣、杨成武、吕正操、余立金一定要参加“八一”建军节的招待会，还要见报。

此时此刻，黄克和被监禁的王尚荣都蒙在鼓里。

这天，黄克在家里，找出两年前儿子柏德去看望父亲时带回来的一件旧毛衣。她把毛衣抱在怀里，上下端详，反复查看。睹物思人，她仿佛看到丈夫就在眼前，久久舍不得放下毛衣。

突然，楼梯上急促的脚步声，打断了她的思绪，接着传来了清脆的敲门声。黄克走上前去，才发现是作战部办公室副主任李锡德。

“好消息！好消息！王部长要解放了，王部长要

解放了……”黄克听到这一消息，高兴得一时竟说不出话来，热泪夺眶而出，她走上前去，紧紧地握住李锡德的手，半晌才问了一声：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我是从专案组那里得到的消息。”

“这是真的吧？”黄克用颤抖的声音，再一次轻声地问道。

“千真万确！本来专案组不让把这一情况告知你，我怕你等得着急，悄悄跑过来转告你！”黄克随即提出要去看望尚在医院的王尚荣！

30日晚，中央“二办”负责人和专案组的两名同志，来到解放军304医院，宣布解除王尚荣的“监护”，但不给他结论。王尚荣表示，不给结论就不出去。他十分坚决地说：“我等你们作好结论再出去吧！已经被关八年了，这短短的时间我也不急，能等下去。不然，我没法向老婆孩子交代啊！见了老战友又怎么说呢？”

正在这时，黄克跨进了病室，走到了王尚荣的床边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专案组人员一见黄克，恶狠狠地问道。

“你能来，我就不能来？”黄克理直气壮地回答。

王尚荣见到黄克进来，如卸重负地说：“他们让我出去，却不给结论，你也没有来，我去哪里？”这时，专案组人员将一张要王尚荣出席“八一”建军节招待会的请柬，递给了黄克。接过烫金的请柬，黄克这时才深信王尚荣是真的“解放”了！

随即，王尚荣搬出了304医院，汽车把他们送到海运仓总参招待所后楼。刚安顿下来，就有人进来，说是要给王尚荣量体裁衣，为明天去参加“八一”建军节宴会作准备，一直折腾到深更半夜才离去。此时，万籁俱寂。室内只有王尚荣、黄克夫妇。

“我知道你会出来的，这么多年我一直盼着这一天！……”

“难为你了，我对不起你和孩子，让你们为我吃尽了苦头！……”他们面面相觑，这是夫妇间的真挚爱情，也是战友间的高尚情谊，八年来的风风雨雨，他们经过了无数的追求和企盼，终于赢得了第一次团聚。

责任编辑 段敏